

# 当代文学的新发展：从新时期文学 到新世纪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综述

谭光辉,唐小林,白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2006年11月2日至5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围绕“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实现了学会的新老交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继任研究会会长。会上,还颁发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十届优秀成果表彰奖”。

会议进入学术交流之前,张炯的发言具有指导性意义。他认为新时期30年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不应无视其存在的问题,要从成绩与问题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理论认识的自觉性,以便更好地推动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随后会议展开讨论,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 一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问题,涌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 1. “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可以成立

雷达(中国作协)认为,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学的整体风貌,文坛由以前的文学期刊一统天下变为网络文学、文学刊物和普通文学出版物三分天下的局面。文学创作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

乡土叙事、极限化的人性书写、历史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倾向以及政治视角的回归等四个方面。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也认同“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从80年代就开始了一种反思传统的、更具现代意识的“现代文学”建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当时风行的文学思潮。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及核心理念,其实就是现代性概念的引入和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於可训(武汉大学)则认为“新世纪文学”不是一个自然时间的划分,而是在于彰显一种文学“新质”的诞生。在他看来,这种“新质”的生长时间开始于90年代初,迄今尚未发展成熟。新世纪文学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应与20世纪文学相对应来考察。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社)认为,“新世纪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命名,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建构,“新世纪文学”是一个言说时代的概念,这种文学形态的兴起首先来自于文学观的改变。新世纪文学的关注视角已扩大到了底层文学和80后写作,下一步还将关注社会写作,尤其是介入型社会写作,他为此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历史地图和现实地图的想法。姚楠(集美大学)认为,“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导向了对当前状态的关注,是文学史研究中精彩的一笔。谢昉(中山大学)认为,探讨新世纪文学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对当下文学走出困境很有意义。

### 2. 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质疑

金汉(浙江师大)认为,“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文学史”的分期分段应从文学时代划分而非社会历史划分,不赞成现在

就开始写新世纪文学史。周晓风(重庆师大)认为,如果“新世纪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史命名的话,那它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文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学转化的过渡阶段,原有的文学机制就需要调整。但当前文艺运作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郝明工(重庆师大)认为,文学命名应该在历史过去之后,并应体现出社会各个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孙德喜(扬州大学)认为,命名问题的实质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命名是一种解读,体现出的是对文学史、现象、流派、阶段的总体性认识,不能初露端倪就仓促命名。子张(浙江工业大学)认为,对当前文学的讨论应先从局部着手,逐渐扩大范围,随着时间的发展,清晰度的提高,命名的准确性和理论意义才能彰显。

### 3. 对划分“新世纪文学”的否定

高玉(浙江师大)从总体上否定了对现当代文学的进一步细分。他认为,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开,并不是依据文学特征,而是按照政治特征来划分的,中国的文学总体上可以分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所谓的当代文学实质上是现代文学的延伸和合理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内部进一步划分出新世纪文学的作法。吴义勤(山东师大)认为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的讨论,焦点应放在呼吁大家进入当下文坛上。高旭国(浙江林学院)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种临时性说法,并非一成不变,也没有必要搞具体年限。向成国(吉首大学)发表了与此大致相同的意见,认为“新世纪文学”更多只是上世纪文学的延续,以后应有更加科学的总结和命名。

## 二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评价

如何评价新世纪文学,是会议讨论的又一热点问题。

白桦(中国社科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1993年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以“陕军东征”为代表,由此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市场化运作,整个90年代成为文坛受市场化思想冲击的时代。进入新世纪,全球化、媒体化、娱乐化对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坛出现一分为三的格局:一是以传统文学期刊为阵地的写作,二是依托市场的文学出版,三是网络写作。传统文学以中老年作家为主,但以青年作者为主体的传统之外的新媒体文学影响却更为广泛,现有文学现象已超出我们原

有的文学经验。很大一批8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都很有才华,对他们进行引导是非常必须的,我们现在与青年作家的对话与沟通还不够。他提及今年4月与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上的争论并非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的一次价值观的碰撞。他认为,在市场的氛围中,必须关注三个问题,一是现有的文学体制没有关注到的文学青年,二是传统作家在市场的冲击下面临着的新挑战,三是现在的文学批评界需要进行自我调整。

杨匡汉(中国社科院)认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文学30年来来的一个重大成就,是脱离近、现代文学而成为分支性的独立学科,这对于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不分化、不深入的局面是学术史学意义上的巨大进步。新世纪六年以来的文学证明,“边界”是需要“守”的,但“边界”既意味着“坚守”也意味着“宽容”。吴义勤(山东师大)认为,近几年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在繁荣中也有遗憾,经典作品一直没有出现;二是当代命名经典的价值比后人的命名更为重要;三是应该从作品出发而非从作家出发来书写当代文学史。谈到文学史书写,张清华(北京师大)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不可能不带有自我对文学史的思考 and 想象,这种思考和想象往往导致了当代文学学科内涵的变迁;当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总的来说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性标准到文化标准再到综合性标准的转变。当代文学史评价标准体系中有三个问题需要继续思考:对中国传统叙事的评价;如何加强作家的研究,以及如何协调文学史各部分的比重问题。文学史的写作还涉及到经典的遴选和重构问题,对此包明德(中国社科院)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构,要解决三个悖论:一是多元文化与经典的悖论;一是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悖论;一是道德眼光与历史意识的悖论。曹万生(四川师大)从价值观的变化、方法论问题、体制论革命、传媒时代和消费时代的开端等四个方面论证了80年代文学是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逻辑起点。顾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顾问)认为,新时期文学应以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为起点,主潮仍然是一场启蒙运动,核心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被发现,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一定会永远流传下去。崔志远(河北师大)认为,“整合”是对历史矛盾冲突之反思中产生的对于历史内部恒常联系的回

归,“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与新世纪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需要整合。朱水涌(厦门大学)通过对王安忆、鬼子和毕飞宇作品的分析和追问,认为当下创作的繁复和杂乱是“现代性”概念在中国传播受挫的表现。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强调了文学与生活、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文学机制应该有所调整,呼吁作家扩大知识面,创作文学精品。

### 三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精神向度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维度、价值立场等,是会议代表深为关切和普遍焦虑的问题。

唐小林(四川师大)在题为“新世纪,文学拿什么来启蒙”的发言中指出,文学启蒙、启蒙文学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高贵传统,其精神贯穿19世纪中叶迄今的汉语文学。“五四”启蒙和“四五”以降的启蒙都实现了新的历史主体建构和转型。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状况下,我们也在发动着新的启蒙,但90年代中期进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并没有渗透到草根阶层,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我们用启蒙的手段和内容在新的历史语境面前已经不堪重负,新时期文学启蒙的历史处境、启蒙的对象、启蒙的任务以及启蒙的目标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超越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既立足于此岸世界又奔赴彼岸世界的新的启蒙的内容和途径,或许是新世纪汉语文学要认真讨论和加以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谢有顺(广东省作协)认为,现今文学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已经产生了一种惯性,我们如何从这种惯性中走出来是一个问题。文学的生命气息流转是不断变化的,这十几年来,“个人化写作”呈泛滥之势,缺乏精神的维度,因此重申“灵魂叙事”,确立健全的“善”的信念,从灵魂的视野出发,看见美、看见希望,是非常必要的。谭光辉(四川师大)提出了“文学契约论”的观点,认为当下文学边缘化问题并非在于“读者死了”,而在于文学家对他的委托人——人民的失约并导致文学向政治、商业和自身的寻租,使文学失信于民,面临着遭公众讨伐的厄运。崔志远(河北师大)也认为,“新世纪文学应强化精神维度”。汪树东(哈尔滨师大)则强调超越性和切己性的价值立场对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的显著意义。方伟(河北省社科院)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创造力正处于困境中,并以长篇小说为

例提出了文学的精神价值来源在哪里等问题。郭宝亮(河北师大)在回应方伟的问题时认为,导致当代文学原创力缺失的原因之一在于强烈的猎奇性,并提醒我们警惕文学“猎奇化”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 四 关于新世纪的底层文学

有关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争论,构成这次会议的一个学术亮点。

孟繁华(沈阳师大)没有直接谈论底层文学,但他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超稳定文化”结构中发现了新世纪底层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他认为,处在边缘文化状态的当下文学和其中的“超稳定文化”因素自产生后一直较为固定。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小说从文化边缘地带和地域性知识中获取灵感和想象的现象才普遍发生,边缘文化是被主流文化、通俗文化、媒体所遮蔽的文化,作家从这些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中,找到了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在这些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中,乡村中国表达得最为充分,因此,从现代文学的乡土文学到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再到当下文学中对乡土文学的再次回归,充分体现了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即守成性。而正是这种守成性必然带来底层文学的繁荣。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认为,底层文学是社会文化转型积淀出来的问题,这个话题是1992年以来唯一一个公共性的文学话题。但“底层”的定义混淆不清,严重影响了这类文学的表达深度;“底层文学”与历史关联中的框架性缺失,又影响了这类文学的发展;“底层文学”的道德期待与限度也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毕光明(海南师大)认为,底层文学已经成为一股文艺思潮,“底层”叙事有着两种姿态,一种是“为老百姓写作”,这种叙事姿态产生的问题是阐释大于写作;再一种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种写作聚焦于特定的生命个体,逼真地刻画社会政治与经济运作给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造成的严重后果。钟秋(云南大学)提出了关于当代文学中底层叙事外延的界定问题。她认为应该把海外华人的底层文学纳入其中,以底层生活为题材和底层人所书写的文学都属于底层文学。颜敏(江西师大)从社会现实和理论两方面探讨了底层文学的发展状况,梳理了“底层文学”的概念,认为“底层”本身是分裂的。与之相呼应,有的学者还对底层文学进行了微观的研究,徐德明(扬州大学)简述了自己



清理“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过程及结果,认为“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叙事特征在于乡下人的乡下记忆多是和痛苦结合在一起的。叶从容(广州大学)认为,岭南都市文学中的打工文学无疑也是底层文学的一部分。魏兰(宁夏大学)以西海固作家群为例,认为不应忽略底层人民写的文学,底层写作者与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是不同的。

由底层文学的讨论延伸到相关问题对话。刘荣林(湖南理工学院)认为,我国需要一部现、当代农民小说史,用来探讨我国农民的心理素质和“生存状态”。贺绍俊(沈阳师大)认为对农民小说的研究很有意义,“农民小说”概念还可以细化,应与“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这些概念区分开来。钟秋(云南大学)认为“乡土文学”带有更多风俗画特色和乡土气息,而“农民小说”更多从政治经济上切入,表现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农民的命运及其心灵变化历程,因此两者都有存在的理由。刘复生(海南大学)认为,“底层”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投射了很多讨论者自己的想象,底层写作的凸显与知识分子本身命运的变化和纯文学的危机有很大关系。白浩(四川师大)认为底层文学要表现苦难,要有赴难意识,虽然底层文学概念本身是暧昧和含混未明的,但我们需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因为苦难不能被合法化。刘容林(湖南理工学院)认为两级分化的过程不可逾越,苦难和两级分化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贺绍俊(沈阳师大)认为此话题的实质是文学能干什么的问题,文学应该承担精神价值的传承。毕光明(海南师大)提出怎样写底层的问题,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可以直接毫不暧昧地挑明、指责体制问题。

## 五 关于新世纪的各体文学

新世纪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也是会议讨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小说,刘川鄂(湖北大学)就“新历史主义解构革命历史小说的途径及其限度”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新历史小说从历史理性、集体话语体系、反映论三个方面解构了革命历史小说。陈红旗(广东梅州嘉应学院)认为,残雪的小说展现了现代性溃败的历史图景,营造了一种反现代性的异端境界。王万森(山东师大)和於可训(武汉大学)对此提出了质疑。谢昭新(安徽师大)从小说的类型、小说的趣味和小说的风格三方面谈了对王蒙小说理论

看法。苏琼(厦门大学)对王安忆《长恨歌》进行了批评,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语言絮叨,语法错误百出,其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隐藏着对极端世俗的“权”与“利”的膜拜。金汉(浙江师大)则针锋相对的指出,不应用自己的价值观评价作品中的人物,不应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的观点混为一谈。李永东(西南大学)也认为应该把作者、人物、叙述者分清。张中宇(重庆师大)坚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评价文学作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保持中立,我们应该更新自己的价值体系。朱水涌(厦门大学)认为,王安忆等作家用物质化书写方式勾勒上海,却又匆匆逃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作家介入现实的这种方式很值得关注。周雪花(河北师大)对铁凝《笨花》中的“故园之美”和“中和之美”,万国庆(浙江嘉兴学院)对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与大众文化的传媒化趋势,陈颖(上饶师范学院)对徐坤小说创作的价值立场及其形成,张恒学(湖南理工学院)对世纪之交的反腐小说,颜水生(海南师大研究生)对莫言小说中“种的退化”的主题等等展开了论述。

关于诗歌,吴思敬(首都师大)认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内容上的从游离现实到回归现实,主体姿态上的从精英化到平民化,写作方式上的由纯粹地模仿西方到回归传统,语言上的由书面化到口语化,表达方式上的由侧重隐喻、抒情到侧重叙事,功用上的由侧重教化到侧重娱乐。他认为从新诗发展过程来看,中国诗歌一向有关注底层、关注平民的传统,而新世纪诗歌保持了这种传统。罗振亚(南开大学)认为,“个人化写作”是90年代先锋诗界的优卓选择,“个人化写作”是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介入时代文化处境、处理生存与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它常以个人方式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的诉求,源自个人话语又超越个人话语,突出了个体生命的声音、风格、语感和话语差异,而个体诗人之间又存在着通约性。孙基林(山东大学)认为,新时期诗歌思潮在走出朦胧诗式的隐喻、象征性修辞方式及思想范式之后,开始由意象经营转向语感和叙事,进而形成并建构了一种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叙述性诗学风格。彭金山(西北师大)对当下诗歌的“口语化”、“通俗化”提出了质疑,提倡一种“反诗之诗”。

关于戏剧和散文,张健(北师大)认为,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话剧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元一体”的话剧生态格局已经成型,即主旋律话剧、通俗话剧和先锋话剧。他将“先锋话剧”的发展分为酝酿期、发轫期、成型期三个阶段,并以主旋律话剧、军旅话剧等为例论证了新时期话剧的世俗化特征。安然(作家出版社)则描述了自现代文学以来中国幽默散文的概况,并对新时期幽默散文的特点作了归纳。章罗生(湖南大学)呼吁建构纪实文学的独立话语与理论体系。

会议还就新世纪的西部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文学等展开了讨论。

在西部文学的讨论中,宁夏的意义得到突显。贺绍俊(沈阳师大)认为,宁夏文学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这些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也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李平(中央电大)将东部文学与以宁夏文学为代表的西部文学进行对比,认为在对比中更能认识宁夏文学的意义。白浩(四川师大)认为,在全球范围中,我们的文学面临着被后殖民化的危险,西部文学同样面临这样的危机,将狭隘化的旧“西部文学”拓展为扩大化的新“西部文学”,是旧“西部文学”延续和发展的需要。

关于女性文学,这次会议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置疑多于肯定,反思多于倡导。单元、唐敏、李云(四川师大研究生)质疑了女性文学的命名,对女性文学存在的根据提出了疑问,认为女性意识本身就值得怀疑,它脱离不了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政治语境。安然(作家出版社)认为,女性文学是男作家和女作家小说中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表达,而不是女作家的所有作品的指称。胡倩一(四川师大研究生)认为,女性文学要有开放的视域,男性维度的引入是必不可少的。尹海燕(四川师大研究生)指出“身体写作”概念的运用仍旧含混不清,需要进一步清理。谭湘(河北教育出版社)认为,应促使女性文学的话语主流由最初的两性对抗发展成

为两性共谐的学术共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王琳(四川社科院)从新时期知识分子叙事中发现了不同于从前的女性形象塑造。邓利(四川师大)梳理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的三个阶段。郭力(哈尔滨师大)认为,女作家书写历史表现出时间性、生命体验和苦难记忆三个特点。禹建湘(湖南吉首大学)将当前女性文学的现状概括为四点:一是女性作家集体浮出历史地表,二是女性作家开始寻求新的写作道路,三是女性写作与时代发展具有同步性,四是继承了80年代以来特有的叙述方式。

在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夏冠洲(南阳理工学院)认为,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多是关于汉族文学的,对少数民族文学和边疆文学很少提及,期待涉及多民族的文学史出现。涂鸿(西南民大)也认为,中国文学不能不谈民族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若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便不是完整的文学史。

关于生态文学,赵树勤(湖南师大)认为,文艺学上的“生态转向”在当代开始较早,但与此相呼应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却显然落后,生态文学在叙事上表现出了自然的“复魅”、神秘主义的叙事方式和生态意象系统的重构三个特点。李玫(东南大学)认为,与生态写作相对应的生态文学批评最终要落实到对于具有强烈人文气质的生态写作的关注上。宋炳辉(《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则区分了广义的文学生态和狭义的文学生态之不同,继而提出应在广义的文学生态中建构经典的问题。

此外,李红秀(重庆交大)就新世纪文学与大众传媒和网络化的关系,江冰(广东商学院)就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批评机制的建立,栗丹(东北财大)就加强对文学消费者的关注,曹慧英(韩国国立仁川大学)就贾樟柯的电影艺术特征,刘永丽(四川师大)就9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怀旧”,王春荣(辽宁师大)就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主义主题,梁彦玲(廊坊师院)就海子长诗的主体意象,阮阿陶(四川师大)就新时期的哲思文学,彭放(四川师大)就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经典阅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责任编辑:唐 普]